

南宋瓜洲筑城考*

黄彬琦

提 要：位于扬州的瓜洲，在南宋时代，受到南北政治军事形势的影响，多次筑城。绍兴年间，宋廷虽有筑城之议，但由于张浚的反对，并未筑城，倒是金军攻下瓜洲后，利用南北战事而留下的小垒有展筑之举。孝宗即位后，瓜洲筑城之举频繁，在隆兴初、乾道四年（1168）、淳熙四年（1177）有过3次筑城。这一时期瓜洲城的形制为南北两城，南城临江且城墙呈拱型，所以称“簸箕城”，但因江涛侵蚀，屡遭废坏。理宗时南北战事再起，为了抵抗蒙军，淮东一带又有陆续的筑城，瓜洲城在宝祐四年（1256）修筑，此次筑城更多地体现在增筑。但在南宋末年战事中，瓜洲城起到的作用较小，一是由于蒙军采取顺江而下的攻势，二是因守城军官弃城遁走，瓜洲城遂归蒙古所有。

关键词：瓜洲城 城墙 南宋 南北关系

扬州市瓜洲镇，自古以来就是战略要地。“虽弹丸，然瞰京口，接建康，际沧海，襟大江，实七省咽喉，全扬保障也，且每岁漕艘数百万，浮江而至，百州贸易，迁涉之人往还络绎，必停泊，于是其为南北之利，讵可忽哉？”^①南宋时期，瓜洲作为江北扬州最后的堡垒和南宋政府北进收复中原的前哨阵地，其军事地位迅速上升。如众所知，宋代经济市镇，筑有城墙者不多^②，但瓜洲镇却存在不断加筑城池的情况，这与南宋时江淮地区特殊的区位和瓜洲滨江临河的交通区位相关。关于瓜洲的研究，邹逸麟《瓜洲小史》对瓜洲的形成及其衰弱、瓜洲的交通枢纽地位进行了概括性的梳理。^③赵苇航、金慎夫《瓜洲古今谈》对瓜洲的历史作了通代的梳理，但未深入。^④张程娟《争夺运河之利：明代瓜洲闸坝兴替与漕运制度改革》则揭示有明一代瓜洲闸坝兴替与漕运制度的关系，认为瓜洲筑闸影响了漕运制度具体运作细节，并对漕运制度及国家财政产生了影响。^⑤不过断代的专精研究尤嫌不足。南宋时期瓜洲城的修筑，记载多见于明清方

* 本文为2017年江苏省社科基金系列专项重点项目“历史时期大运河沿线市镇的变迁及个性化发展模式研究（项目编号：17DDA011）”的阶段性成果之一。

① 吴耆德、王养度纂：嘉庆《瓜洲志》卷1《疆域·瓜洲》，“扬州文库”第1辑，广陵书社，2015年影印本，第38册，第123页。

② 唐宋城镇没有城墙的论断，最早见于日本经济史学者加藤繁，但今人研究已经指出其误。有不少市镇都修有城墙，郭正忠认为唐宋市镇有城墙的原因有三：一是与市镇的起源有关，二是市镇在同州县城转化时建城，三是为防卫市镇而筑城（参见郭正忠：《关于唐宋市镇“城墙”问题的考察——读〈支那经济史考证〉辨误》，《齐鲁学刊》1986年第4期）。瓜洲不但有筑城，且次数较多，同当时的政治军事联系颇深，在诸多经济市镇中，也是比较特殊的。

③ 参见邹逸麟：《瓜洲小史》，罗卫东、范今朝主编：《庆贺陈桥驿先生九十华诞学术论文集》，浙江大学出版社，2014年，第106—111页。

④ 参见赵苇航、金慎夫：《瓜洲古今谈》，《扬州师范学院学报》（社会科学版）1981年第2期。

⑤ 参见张程娟：《争夺运河之利：明代瓜洲闸坝兴替与漕运制度改革》，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》2018年第2期。

志，且多语焉不详。^① 基于此，笔者拟结合相关的政治经济背景，对南宋瓜洲的筑城情况进行细致梳理。^② 不当之处，尚祈方家指正。

一 南宋以前瓜洲筑城情况

南宋以前，瓜洲有零星的筑城记载，需要加以说明。瓜洲城池的修筑，可以追溯至唐代，但早期记载十分模糊。明嘉靖时唐铎谈瓜洲筑城：“考之前志，唐宋皆尝有城，虽遗迹不可考，而今城隍庙尚存，则其验已。”^③ 乾隆《江都县志》云：“唐末沙连北岸，渐有城垒。”^④ 又据民国时修成《淮系年表》载：“唐末筑瓜洲城垒，据运河津要。”^⑤ 则唐末瓜洲可能已有城，但对筑城的具体情况，并无更早的文献印证。从北宋时瓜洲无城的情况来看，唐代瓜洲城的存在时间不长，所谓城，很可能是城垒之意，即出于军事防备目的而临时设立城砦。在地理津要之处设置临时军事城垒早已有例可循，如扬州一地有“扬子城”。唐武德六年（623），辅公祐反，七年，“河南安抚大使任瑰拔扬子城”^⑥。唐初尚无瓜洲，扬子即当时扬州南濒长江处，此言扬子城，可能就是临时性的军事工事。唐中后期瓜洲屡有陈兵，先是肃宗至德元年（756）裴茂屯瓜洲，《旧唐书·玄宗诸子》载：“（李）铤麾下骑一百八十人，遂率所领屯于扬子，成式使判官评事裴茂以广陵步卒三千同拒于瓜步洲伊娄埭。希言将元景曜及成式将李神庆并以其众迎降于璘，璘又杀丹徒太守阎敬之以徇，江左大骇。裴茂至瓜步洲，广张旗帜，耀于江津。璘与偕登俾望之竟日，始有惧色。”^⑦

裴茂既屯于伊娄埭，则此“瓜步洲”当即瓜洲。瓜洲去南岸镇江不远，故李璘立于润州城上，可见瓜洲广张旗帜。上元元年（760），刘展叛乱，复设兵于瓜洲，“展军于白沙，设疑兵于瓜洲，多张火、鼓，若将趣北固者，如是累日”^⑧。刘展渡江犯润州，次年田神功讨刘展，“与邢延恩将三千人军于瓜洲，壬子，济江。展将步骑万余陈于蒜山；神功以舟载兵趣金山，会大

① 筑城记载的模糊使得今人认识错误，如刘建国在其文章中说：“但尽管如此，史料记载宋代仅有的两次瓜洲城的修建，皆是由镇江官员受命主持。”（刘建国：《长江西津、瓜洲两渡及其交通属性研究》，《镇江高专学报》2017年第3期）

② 本文讨论筑城史，何适对扬州筑城研究的相关文章对笔者启发颇大，为如何分析筑城史提供了一些思路，如其《南宋孝宗朝扬州城池建设考——兼论地方视野下的“孝宗恢复”》。参见《史林》2016年第2期；《南宋扬州蜀冈上城池建设新考》，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》2017年第3期。此外，既论述筑城，绕不开城墙的问题，相关研究可参见孙兵：《在广阔的视野中日渐丰满的城墙面相——中国古代城市城墙史研究综述》，《史林》2010年第3期；成一农：《中国古代城市城墙史研究综述》，《中国史研究动态》2007年第1期。筑城往往同当时之政治背景有关，南宋政治史的研究蔚为大观，在本文撰写过程中，主要参考的有专著有粟品孝：《南宋军事史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8年；何忠礼：《南宋政治史》，人民出版社，2008年；〔日〕寺地遵撰，刘静贞、李今译：《南宋初期政治史研究》，复旦大学出版社，2016年。论文方面则有汪圣铎、乔东山：《史浩与宋金和战——以德顺之败和隆兴北伐为中心》，《浙江学刊》2011年第2期；夏令伟：《南宋史浩与张浚之争析论》，《四川师范大学学报》（社会科学版）2010年第4期，等等。

③ 郑晓：《郑端简公奏议》卷7《瓜洲筑城疏》，《续修四库全书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2年影印本，第476册，第648页。

④ 五格、黄湘修，程梦星等撰：乾隆《江都县志》卷3《城池》，“扬州文库”，第1辑第11册，第34页。

⑤ 武同举撰绘：《淮系年表》表4《唐及五季》，民国17年（1928）铅印影印本。

⑥ 《新唐书》卷87《辅公祐传》，中华书局，1975年标点本，第3725页。

⑦ 《旧唐书》卷107《永王璘传》，中华书局，1975年标点本，第3265页。

⑧ 《资治通鉴》卷221《唐纪三十七》“肃宗上元元年十一月”条，中华书局，1956年标点本，第7099页。

风，五舟飘抵金山下，展屠其二舟，沉其三舟，神功不得渡，还军瓜洲”^①。裴茂与田神功分别设军于瓜洲，同长江南岸的叛军对抗，瓜洲因此成为两军对峙的第一线，在这样的重地设置城垒合情合理。由于此类军事性质的城垒专为战争而设，战事结束后不久城垒便当逐渐废弃，是故留下记载不多，进入北宋以后瓜洲便无城池的存在。

宋代，瓜洲屡有筑城，而所有筑城行为都集中于南宋，这同南宋时北方巨大的军事压力息息相关。与之相对的，北宋时期江淮、江南地区相对和平，故瓜洲未见城池修筑。

二 宋高宗时的筑城

南宋时有关瓜洲城的记载始见于绍兴末年。绍兴三十一年（1161），完颜亮集中兵力大举南下，试图灭亡南宋，不久即渡淮到达瓜洲。南宋周南记瓜洲战事云：“初，瓜洲虽未有城，亦略有短垣，四围列植为鹿角，独中留出兵门。既战，胜负未决，（李）横引军归营，稍休息，士卒方解鞍啜食，敌骑忽驰而至，驱所掠百姓，倏忽壕堑皆满，拔植三面而入，我师于是尽为敌歼焉。”^②

由此则材料可知，此时瓜洲没有城，只有“短垣”，即较为低矮的墙。出于军事防御需要，又在四围植以树木，挖有壕堑作为屏障。这些军事措施极有可能为了应对金人南下而采取的临时之举，并没有起到很好的效果。倒是金人在攻占瓜洲后，注意到瓜洲的军事意义，有筑城之举。《中兴御侮录》记完颜亮“以江南屯守甚坚，未可轻越，遂保据扬州，增筑濠垒，婴城自固”，又“分据沿江要害，创城于瓜洲，窥伺攻劫，芟地植麦，为来年攻守计”^③。宋金双方以长江为界对峙，金人守战策略非常清晰。其一是保据扬州，筑城掘壕增垒以自固；其二是在城外屯田进行农业生产，以图长期驻扎。瓜洲是金军江北军事防御体系中的重要据点，在此沿江地区设置军事堡垒，完善防御体系，有利于徐图南下。又《三朝北盟会编》载虞允文引兵过江事，云：“虞舍人命战士各备车船，径趋北岸瓜洲，将泊岸，复回，虏兵惊惶，持满以待。其船中流上下，转回如飞。虏众皆凭垒纵观，骇愕相谓曰：‘南军有备如此……且采石渡方此狭甚，而我军犹不利，请徐为之谋，以伺其隙。’”^④南宋军队列兵江上，金军则“凭垒纵观”，金人于垒上便可观江上宋军，可见有筑濒江之垒，与前筑瓜洲城或是互为犄角的军事设置。

南渡之初，高宗驻蹕之所数易，国事未定，瓜洲虽为军事战略要地，而没有筑城尚能理解。但到了绍兴末年，瓜洲竟然只能凭借短垣和树木去抵挡金军，江北守备困顿至此，实在让人费解。实际上，对于瓜洲军事上的重要性，南宋君臣不是没有认识到。绍兴二年（1132），吴表臣就曾上奏言：“大江之南，上自荆、鄂，下至常、润，不过十郡之间，其要紧处，不过七渡。上流最急者三：荆南之公安、石首，岳之北津；中流最紧者二：鄂之武昌，太平之采石；下流最紧者二：建康之宣化，镇江之瓜洲是也。惟此七渡，当择官兵修器械。”^⑤认为瓜洲乃沿江最重要的七个军事要塞之一。到了绍兴末年，翰林史浩再次提出在江北构建军事防御体系的意见，议于

① 《资治通鉴》卷222《唐纪三十八》“肃宗上元二年正月”条，第7103—7104页。

② 周南：《山房集》卷8《杂记》，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7年影印本，第1169册，第114页。

③ 佚名：《中兴御侮录》卷上，《全宋笔记》第5编，大象出版社，2012年标点本，第1册，第43页。

④ 徐梦莘：《三朝北盟会编》卷239“金国主亮退和州以其众趋淮东”条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7年影印本，第1719页。

⑤ 李心传撰，胡坤点校：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》卷57“绍兴二年八月辛丑”条，中华书局，2013年标点本，第3册，第1155页。

瓜洲、宣化、采石为城坞堡垒，“以防虏骑冲突，置军人妻女于坞中，屯战舰其下，使事急有势援，贼不得遽窥大江”。史后任参政，“复伸前说”，高宗也以冯方为提举负责修筑。^①但对这一提案，张浚表示反对，他认为“不守两淮而守江干，是示敌以削弱，怠战守之气，不若先城泗州”^②。面对朝臣的争论，高宗最终还是偏向张浚，故瓜洲城最终并未修筑。

三 宋孝宗时的筑城

孝宗朝是宋廷于瓜洲建城之始，见于文献记载的筑城有3次，分别在隆兴初年、乾道四年（1168）和淳熙四年（1177），但对筑城细节，明清时期地方志或地理总志的记载不一。明清记载去宋代时间较远，本不可尽信，故下文辅以南宋当时之史料，参取方志记载进行考证。

一是隆兴初年第一次筑城。嘉靖《维扬志》卷7《公署志》载：“镇旧无城……至隆兴初始奉诏建筑，南城临大江，东西北长四里一十步，门拖板桥二座，遇虏警则四郊农民徙居其中，隐若一障也。”^③言之凿凿，故隆兴初年有筑瓜洲城之举当无异议。而筑造时间和城的形制可由钱端礼的奏疏中略知一二。乾道元年（1165）五月，钱端礼出至扬州，视察后上申朝廷言：“虽未至楚泗淮上，守备大略已见。扬州城补葺破敝，全无楼橹，何以容人？借使有人，须积粮为一城之计可也。设敌人自天长径入，瓜洲旷野，约可容二十万。则扬州岿然在后，讵能坚守？瓜洲两小城，不过容五七千人，岂足当其锋？两处守御止如此。”^④

瓜洲城的形制，钱端礼言为两小城，又嘉靖《维扬志》中称“南城临大江……东西北长四里一十步”，两城应为南北排列，但两城是相连还是分开，无法确定。前文讲到，金军曾在瓜洲修筑城池以自固，又于沿江一带修建了堡垒，便于观察江南军情，故颇疑此南北城正是在这两处的基础上修建。钱端礼虽言小城，但从可容五七千人来看，其规模并不小，具备一定的军事防御能力。

这一时期，先前史浩与张浚的守淮守江之争仍然存在。先是，史浩建议于瓜洲筑城，并令史正志负责此事，“正志又受浩旨，聚两路监司守臣往瓜洲相度筑垒事”^⑤。但张浚仍然反对，并同史正志辩论。^⑥史浩、张浚两人的矛盾相当激烈，《宋史·张浚传》载：“翰林学士史浩议欲城瓜州、采石，浚谓不守两淮而守江干，是示敌以削弱，怠战守之气，不若先城泗州。及浩参知政事，浚所规画，浩必沮之。”^⑦又杨万里《张魏公传》载：“浩既为参知政事，浚所规画，浩必沮挠，如不赏海州之功，沮死骁将张子盖，散遣东海舟师，皆浩之为也。”^⑧

实际上，史、张二人都是“抗战派”。首先看史浩，他曾建议孝宗恢复胡铨、李光等人的官

① 参见罗潜：《宝庆《四明志》卷9《叙人中·先贤事迹下》，“宋元方志丛刊”，中华书局，1990年影印本，第5册，第5097页。

② 《宋史》卷361《张浚传》，中华书局，1977年标点本，第11308页。

③ 盛仪：《嘉靖《惟扬志》卷7《公署志》，“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”，上海古籍书店，1963年影印本，第12册。

④ 楼钥：《攻愧集》卷92《观文殿学士钱公行状（代汪尚书）》，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，第1153册，第418页。

⑤ 朱熹：《张忠献公浚行状》，杜大珪：《名臣碑传琬琰之集》中卷55，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，第450册，第660页。

⑥ 参见《宋史》卷396《史浩传》，第12067页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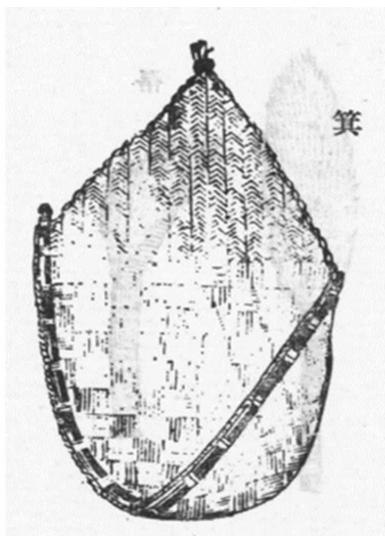
⑦ 参见《宋史》卷361《张浚传》，第11308页。

⑧ 杨万里：《诚斋集》卷116《张魏公传》，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，第1161册，第470页。

职，并起用积极主张抗金的陆游等人，下诏雪岳飞冤屈，“复其官爵，禄其子孙”^①，又“逐秦桧党人，仍禁辄至行在”^②。同时，他又建议孝宗联络北方义军为北伐做准备孝宗采用了他的建议，于是“赍蜡书间道往中原，招豪杰之据有州郡者，许以封王世袭”^③。再看张浚，他初次面见孝宗时就建议迁都建康，以动中原之心，称“人主之学，以心为本，一心合天，何事不济”^④？又主张坚守两淮，先城泗州用师淮甸，进舟山东，以为西线吴璘声援。不过与张浚的策略相比，史浩的策略似乎更加“保守”，建议先图稳固计，即先稳定后方，再伺机出兵北伐，并不主张贸然出击。对于张浚激进的北伐策略，他斥责道：“帝王之兵，当出万全，岂可尝试以图侥幸？”^⑤ 他们争论的焦点并非是战与不战，而是作战策略和方式。

最终的抉择者还是宋孝宗，他采取较为折衷的方式解决争论。一方面，在整体的军事策略上，采用张浚的建议，隆兴元年（1163）绕开三省，由枢密院直接命将出战。另一方面，在筑瓜洲城的问题上，仍采取史浩的建议，大力修筑，毕竟“北伐”的前提是后方稳定，沿江一线的军事防御体系也必须完备起来。

二是乾道四年（1168）第二次筑城。乾道四年，瓜洲城再次修筑。乾隆《江南通志》载：“瓜洲城，在府南四十五里大江之滨。宋乾道中筑，后圯。”^⑥ 又乾隆《江都县志》载：“唐末沙连北岸，渐有城垒。宋乾道四年筑城，人号之曰‘簸箕城’，不久即废。”^⑦ 据《肇域志》所载，这次负责筑城的人是镇江都统军王友直：“瓜州故无城……至乾道四年，镇江都统军王友直始奉诏筑瓜州南北城，后废。”^⑧ “簸箕城”应该是得名于城的形制，类似通常说的“龟形城”“八卦城”等。据《王禎农书》所画之簸箕图（见右图）^⑨，城墙有呈明显的弧线状。这种形制在中国古代城市城墙中相当少见，瓜洲地处平原，城墙不受地形的影响，呈现方形或者圆形似乎更合常识。修筑成簸箕状或有特殊的意义。一条关于真州筑城的记载为我们提供了线索。嘉定二年（1209）八月，诸军粮料院潘军出守真州，有《真州修城记》记其筑城之举，对瓜洲城也略有叙述，兹记如下：



嘉定二年八月，诸军粮料院潘军被命出守，当兵荒饥馑之余，几不成邦，既属以劳，来安集之政，又以城筑委之……乃大肆其力于斯城，因前功而增筑之……郡之井市与漕台皆在城南大江之滨。议者欲如瓜州（洲）之城，创为两翼，自城到江。以蔽遮之事重费多，未

① 《宋史》卷396《史浩传》，第12066页。

② 《宋史》卷33《孝宗一》，第621页。

③ 《宋史》卷33《孝宗一》，第621页。

④ 《宋史》卷361《张浚传》，第11307—11308页。

⑤ 《宋史》卷396《史浩传》，第12066—12067页。

⑥ 赵弘恩等监修，黄之隽等编纂：乾隆《江南通志》卷20《舆地志·城池一·扬州府》，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，第507册，第618页。

⑦ 五格、黄湘修，程梦星等撰：乾隆《江都县志》卷3《城池》，“扬州文库”，第1辑第11册，第34页。

⑧ 顾炎武：《肇域志》，《顾炎武全集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1年标点本，第6册，第74页。

⑨ 王禎撰，王毓瑚点校：《王禎农书》农器图谱集8《茶黄门》，农业出版社，1981年标点本，第271页。

易骤举。余追记未冠时，侍亲泊江干，登鉴远亭，访之居民，指其前曰：“顷有哄市，悉垫于渊。”江外有沙洲数十里，虽隔皇天荡之风涛，而激水北来，相侵未已。不数年，问之宦游者，则鉴远亦为壑矣。是知两翼之城，不至江滨则不足恃，岸既善隳，不知所止，又何恃也？将为久计，则更宜详处而审订之。^①

潘军修真州城，筑城后城墙并不能包裹城南江边的井市漕台，遂有人提议如瓜洲城之例，在江边另筑城包裹之。嘉定时已为宁宗朝，去上述乾道元年（1165）有44年，但城池已成，当不再发生大变化，所有不过修筑废弃事而已。瓜洲所筑两小城，楼钥称其“并为两翼”，结合真州筑城事来看，瓜洲筑城两处的原因则明。瓜洲有北城一处，北城去江稍远。但瓜洲渡既为往来交通要冲，人员来往繁多，自然就发展起来，显而易见，主城往南沿河至江边，有如真州城外江边之“井市漕台”，因为它们距离北城较远，便又筑城，起包裹瓜洲南部滨江市井之目的，是为南城。又因南城紧靠江边，故沿江筑成弧形，以抵御江涛，因此人们将此弧形之南城称为“簸箕城”，如此，上引明清记载混乱的问题便得到解决。

回到《真州修城记》，其中提到真州城南边江岸坍江眼中，如江边有鉴远亭，楼钥在未加冠时曾登亭，而不过数年之后鉴远亭便已为壑。而陆游曾路过真州，其《入蜀记》载：“七月一日，黎明离瓜洲，便风挂帆，晚至真州，泊鉴远亭。”^②《入蜀记》写于乾道五年（1169），可见其时，由瓜洲起溯江而上，一天刚好可抵真州南江滨，陆游就是在这里看到了鉴远亭。按楼钥生于绍兴七年（1137），“余追记未冠时”，设以古时男子15岁加冠，则楼钥儿时登鉴远亭当在（绍兴二十二年）1152年之前。若如其言，“不数年，问之宦游者，则鉴远亦为壑矣”，则乾道五年陆游过真州如何能泊鉴远亭？要之，在鉴远亭陷于江中后，民众在后来的江岸边又重新修筑了鉴远亭。通过以上的分析，值得注意的有两点，其一，真州江岸风涛较大，江岸屡遭侵蚀；其二，在江岸及岸上建筑遭风涛摧毁后，人们往往在后来新江岸复修前有建筑。由真州的例子可知，瓜洲修筑成簸箕形可能有两点原因：一是瓜洲南边靠近江岸处经济较发达，是市井贸易之处，所以筑新城包裹起来；二是出于抵御风涛。而废弃也是因为濒临长江，容易坍塌。既已明此两点，则瓜洲城之事便得以解释。所谓城池圯废之事，主要发生在南城“簸箕城”上，瓜洲同真洲，屡遭风涛^③，虽将南城筑成弧形，然并不解决根本问题，在乾道四年筑城后不久，或是南城“簸箕城”屡造侵坏，或是江岸圯毁，南城失去了城池的防御作用。

三是淳熙四年（1177）第三次筑城。淳熙年间，瓜城迎来孝宗时代最后一次修筑。淳熙四年，徐子寅除淮南运判，不赴，九月再命，仍专一措置督修城垒，五年兼权扬州，“于是瓜州城成”。这一次的修筑，留下的记载较少，但徐子寅此人亦值得注意，在筑成瓜洲城一年后，他便“除知扬州”，淳熙六年八月暂差知楚州，不久又“修筑高邮、兴化、宝应县石閘、斗门、函洞、堤岸，可以固护民田约三千七百余顷”^④。此外，徐子寅曾“于山阳、宝应置三十六庄寨”^⑤，在扬州一带建设了较多的军事与民事工事，这些措置是一整体的地方军事建设行为。两年前的淳熙

① 楼钥：《攻愧集》卷54《真州修城记》，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，第1153册，第7—8页。

② 陆游：《入蜀记》卷2，《全宋笔记》，第5编第8册，第168页。

③ 如元人郭昇抵瓜洲渡江，“风涛可畏，抵舍日犹未西”（郭昇：《云山日记》卷下，《续修四库全书》，第558册，第266页）。

④ 楼钥：《攻愧集》卷91《直秘阁广东提刑徐公行状》，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，第1153册，第409页。

⑤ 叶适：《水心集》卷18《华文阁待制知庐州钱公墓志铭》，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，第1164册，第345页。

二年，郭棣筑扬州堡寨城，时间上十分相近。这些筑城行为很可能是孝宗又一次在地方的军事准备动作。^①一些传统的观点认为孝宗执政的后期其军事态势往往较为消极，其本人也转向佚乐，但淳熙初地方之筑城军事行动似体现出孝宗始终未忘北伐之志。^②

四 宋理宗时瓜洲城的筑城

据载：“瓜洲渡……今有石城三面。□□为□，介于江、淮之间，南之潇湘，北走秦、陇。”时人又诗云“佛狸马死无遗骨，阿亮台倾只野田”“南北休兵三十载，桑畴麦垅正连天”^③。可见到理宗时，瓜洲一地尽是桑禾之景，瓜洲城只存有石城三面，失去了军事防御的作用。到了理宗后期，在原有石城的基础上，瓜洲城迎来了第五次修筑，事在宝祐四年（1256）。至顺《镇江志》载：

赵与峕以总领兼郡。是时，瓜洲遥隶镇江，官人给官会三十万，使修瓜洲城壁。自水门及东，护坦、万人楼、天子记城身、东弩台、石脚，皆因旧加新。边江女须护城四百六十四丈，东西排梁木四十二丈，蛤蜊坝二十五丈，皆一新创造。庀工于七月，迄于五年五月。^④

由所引材料可知，此次修筑还是颇费了一些心力。一方面是对年久失修的旧有设施进行翻新，另一方面是新修了很多设施。前者包括水门与其东的护坦，万人楼，弩台、石脚等，后者如在江边修筑464丈“女须护城”，在城外设东西排梁木42丈，蛤蜊坝25丈。有些修筑工事的名称在现在看来略为陌生，需加以说明：

水门：水门一词有多种含义，有临水城门、水闸等，《水经注》中说“依北岸立水门，门广四丈，立水十丈”^⑤者即是水闸。从后文水门之东便有护坦来看，该水门为水闸的可能性更大。

护坦：一般指闸、坝上下游保护河床免受冲刷的底板。

石脚：有山脚、石砌墙基两意。前者如鲍溶《玉山谣奉送王隐者》诗云：“凤皇城南玉山高，石脚耸立争雄豪。”^⑥后者如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载：“三面皆各有大沟，四面有大河，下面石脚系寨门。”^⑦此处当取石砌墙基意。

女须护城：按此名或可拆为“女须”“护城”二词。宋代“女须”有姐之意，如姜夔《探春慢》词序云：“予自孩幼随先人宦于古沔，女须因嫁焉。中去复来，几二十年，岂惟姊弟之

① 有关郭棣筑扬州堡寨城的研究较多，如何适：《南宋孝宗朝扬州城池建设考——兼论地方视野下的孝宗恢复》，《史林》2016年第2期；何适：《南宋扬州蜀岗上城池建设新考》，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》2017年第3辑；汪勃、范东日：《再谈南宋扬州蜀岗上城池的位置范围》，《东南文化》2020年第2期等。

② 淳熙年间，孝宗矢志不忘恢复。如《玉海》载：“（淳熙）三年，权礼侍郎李焘进《四系录》，记女真、契丹起灭，自绍圣迄宣和、靖康，凡二十卷。上曰：‘朕可一日忘此虏哉！’”（王应麟：《玉海》卷58《艺文》“淳熙四系录”条，上海古籍出版社·上海书店，1987年影印本，第1117页）

③ 祝穆撰，祝洙增订，施和金点校：《方輿胜览》卷44《淮东路·扬州·山川》，中华书局，2003年标点本，第793页。

④ 俞希鲁：至顺《镇江志》卷20《地理》，“宋元方志丛刊”，第3册，第2879页。

⑤ 酈道元著，陈桥驿校证：《水经注校证》卷14《鲍丘水》，中华书局，2007年标点本，第340页。

⑥ 鲍溶：《鲍溶诗集》卷6《玉山谣奉送王隐者》，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，第1081册，第553页。

⑦ 李焘：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489“绍圣四年七月戊辰”条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5年标点本，第11613页。

爱，沔之父老儿女子，亦莫不予爱也。”^①又其《浣溪沙》词序：“予女须家沔之山阳，左白湖，右云梦，春水方生，浸数前里。”^②则女须护城可视为原瓜洲城的姐妹城，位于原城之南，边江。此前孝宗时瓜洲筑有南北两城，而南城遭风涛败坏，此次修筑女须护城，极有可能遵照当时建城遗意。新城464丈，约莫是县邑城墙的规模。^③

排梁木：当为与城墙相辅的防御工事，如李曾伯《再乞免兼状》云：“泗上之城壁，仅如一堡。淮、招两郡，俱未有排梁、串楼之木，至于器甲，则所在阙然。”^④又陈规《守城录》载：“横直深埋排叉木以防贼急登城上”，“墙里鹊台上栽埋排叉木”^⑤。所谓排梁木当用于城防无疑。就长度推测，排梁木42丈，女须护城464丈，此木当置于城门对中，起防敌军直接奔袭城门之用。

蛤蜊坝：不见其他相关记载，既言坝，可能为水利设施，按宋制1丈合约 $3\frac{1}{3}$ 米，则此坝宽约75米，当为一防江潮之工程。推测此坝或紧挨长江，一般来说沿江区域潮落以后会有许多蛤蜊等生物留于岸上，这可能是蛤蜊坝名称的由来。

宝祐年已是蒙宋交战的时期，此前嘉熙三年（1239），吴潜就以“鞑贼今岁入寇，奋于常年，而窥伺淮东之意尤锐”，奏请增兵万人分屯瓜洲、平江等处，以“防拓内外”。当时的瓜洲已有防城军1247人，吴潜则建议招兵，“内步人五千，专招淮人，屯戍瓜洲，外以助维杨（扬）掎角之势，内以张江面虎视之威”^⑥。蒙哥汗掌权后（淳祐十一年，1251）不久，蒙古统治者采纳姚枢建议：“何若以是秋去春来之兵，分屯要地，寇至则战，寇去则耕。积谷高廩。边备既实，俟时大举，则宋可平。”^⑦其具体表现之一便是蒙古改变了以往“一岁一钞掠之，害其耕，夺其聚，杀其民人，使不得供其军赋，谓之涸水取鱼之法。才掠即去，虽去不归”^⑧的政策，开始以汉法治汉地。在攻占地区兴筑城墙就是一项重要表征。为应对这一情况，南宋执行的一个对策即在沿边地区亦强化筑城。瓜洲城修于宝祐四年，而正是在这一时期，南宋有相当多的筑城举动，如宝祐二年（1254）筑东海城、扬州宝祐城、光化新旧城、均州龙山城、广陵堡城。^⑨毫无疑问，这些筑城行为可视为一个整体军事行动，是南宋对蒙古军事政策改变作出的应对，以期对即将到来的战事作足准备。

宝祐时筑瓜洲城，其在宋末战争中起到的作用却十分局限。瓜洲虽为交通要冲，但毕竟形成不久，其地又为沙洲，抛开军事因素，其本身并达不到所谓城市的规模，只是县镇而已。瓜州城的修筑因主要出于军事原因，其城的规模同其经济发展是不匹配的，设城主要作军事用途，首当其冲的就是有大量军费开支。南宋末期的刘克庄作《瓜州城》：“先朝筑此要防边，不遣胡儿见战船。遮断难传河朔檄，修来大费水衡钱。书生空抱鸣鸡志，故老能言饮马年。惭愧戍兵身手

① 姜夔：《探春慢》，唐圭璋编：《全宋词》，中华书局，1965年标点本，第3册，第2179页。

② 姜夔：《浣溪沙》，唐圭璋编：《全宋词》，第3册，第2174页。

③ 参考包伟民：《宋代城市研究》表1-9宋代县邑城市表，中华书局，2014年，第77—78页。如奉化县城648丈，定海县城450丈，包伟民认为东南地区县邑城墙的周长大体在10宋里到2-3宋里之间。

④ 李曾伯：《可斋杂稿》卷15《再乞免兼状》，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，第1179册，第326页。

⑤ 陈规：《守城录》，《全宋笔记》，第9编第1册，第248、251页。

⑥ 吴潜：《宋特进左丞相许国公奏议》卷3《奏乞增兵万人分屯瓜洲平江诸处防拓内外》，《续修四库全书》，第475册，第148—150页。

⑦ 姚燧：《牧庵集》卷15《中书左丞姚文献公神道碑》，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，第1201册，第548页。

⑧ 姚勉：《雪坡集》卷2《庚申封事》，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，第1184册，第11页。

⑨ 参见胡昭曦主编：《宋蒙（元）关系史》，四川大学出版社，1992年第183—189页。

健，箔楼各占一间眠。”^① 指出的就是这一问题。再者，蒙军在灭宋战争中采取了正确的军事策略，先拿下上游的襄樊、川蜀，最后顺流而下，攻克临安，避开了强攻两淮由长江下游渡江的方案。如此，则瓜洲城在抵御北敌渡江时所起的作用就被大大地弱化了，更不要说守城长官在大军压境之时早已焚城逃跑，将其交入敌手：“宋淮东制置司尽焚城中庐舍，迁其居民而去。阿术创立楼橹战具以守之。”^② 在拿下瓜洲后，蒙军于此亦有所营建，并在扬子桥等地设防，利用瓜洲之优势交通位置，反过来遏制长江以北的宋军，使江北宋军难于南下营救。^③ 可以说直至宋亡，瓜洲的地理位置重要性都未丧失，但瓜洲城却也不再属于南宋，而归蒙古所有。

五 瓜洲筑城的军事意义

南宋时瓜洲筑城次数多，规模大，但朝堂之上围绕瓜洲城却始终有一番激烈讨论，从这些官员的言论入手，有助于理解瓜洲筑城的军事意义。史浩与张浚之争已见前文，可分为支持筑城与反对筑城两派。除二人外，又有许多官员发表过自己的看法，反对者多如张浚，认为瓜洲筑城意味着朝廷主动弃置两淮，于对金战事无益，并会丧失两淮和扬州之战意。如陈造《上王参政札子》载：

故修筑者多，彼未来，吾已自弊，彼来，败吾一，其他已破胆矣。吾前日城筑之费，不知纪极，随修随坏，及其临事，夫何可恃？扬州之城亦既二十里，使其受敌，非数万人不支，而又创为小堡，万一敌恃众以攻我，能分兵为两乎？我能两守，敌独不能两围乎？此其儿戏欺君，已甚可笑。而瓜洲去扬州五十里，瓜洲有城，扬州之兵肯为必死计乎？是盖惩辛巳刘琦之败，而借口洗足登舟之说。^④

孝宗命袁枢视察真、扬、庐、和四郡，他回来总结两淮形势时说：“两淮坚固则长江可守，今徒知备江，不知保淮，置重兵于江南，委空城于淮上，非所以戒不虞。瓜洲新城，专为退保，金使过而指议，淮人闻而叹嗟。谁为陛下建此策也？”^⑤ 张浚、陈造、袁枢的说法不无道理，但孝宗

① 刘克庄：《后村集》卷1《瓜州城》，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，第1180册，第9页。

② 《元史》卷8《世祖五》，中华书局，1976年标点本，第165—166页。

③ 参见刘岳申：《文丞相传》，文天祥著：《文天祥全集》卷19《附录》，中国书店，1985年，第489—490页；刘敏中：《平宋录》卷中，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，第408册，第1048—1055页。

④ 陈造：《江湖长翁集》卷27《上王参政札子》，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，第1166册，第342—343页。

⑤ 《宋史》卷389《袁枢传》，第11935—11936页。按：笔者注意到，围绕筑城有争论的这些官员，背后似有不同的政治倾向，如袁枢与张浚的关系就极为密切。袁枢先任太府丞兼国史院编修，再权工部郎官累迁兼吏部郎官，又迁军器少监。（《宋史》卷389《袁枢传》，第11935—11936页）。淳熙六年（1179）他任太府寺丞，七年为秘书丞，九年五月为军器少监（佚名撰，张富祥点校：《南宋馆阁续录》卷9《官联三》，中华书局，1998年标点本，第366页），则此次视察两淮当在淳熙六至八年间。而其所言瓜洲新城，当即指淳熙四年之瓜洲城。袁枢对瓜洲筑城表示反对，而他给出的理由几乎同此前张浚反对的理由相同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为张浚作传的杨万里同张浚关系密切，而袁枢同杨万里同样亲密。两人年轻时就同为太学官，后来袁枢完成《通鉴纪事本末》，杨万里为其作序，并将其人其书大肆夸耀一番。（杨万里：《诚斋集》卷79《袁机仲通鉴本末序》，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，第1161册，第69—70页）此外，后来在淳熙十二年，杨万里还向丞相王淮推荐了包括袁枢在内的许多人才。有如此关系，不得不让人怀疑筑城争论的背后有朝中党派对立的因素。而最终瓜洲城由王友直、徐子寅修筑，也体现出孝宗朝政治的一些特点。限于篇幅与本文主题，在此不做展开，笔者拟另撰文说明。

仍选择在瓜洲多次筑城，显然是看到了瓜洲重要的军事地位。黄榦曾上奏请求筑汉阳城，他在札中举瓜洲城为例：

使汉阳有城，虎视江滨，孰敢越吾境而为寇耶？京口之有瓜洲，所以通淮浙往来之道，武昌之视汉阳，犹京口之视瓜洲也。瓜洲有城，则师之出入皆有所恃，武昌之师自汉阳而济者，绝江之后，便无驻足之地。比其反也，前有长江之阻，后有敌人之虑。武昌之师不敢久驻，江北者无城故也……瓜洲非郡，尚不可无城，而况汉阳古之沔州，冲要之地乎？此则城壁之不可以不筑也。^①

按黄榦于嘉定八年（1215）知湖北汉阳军，此札当上于当时，虽距孝宗时瓜洲筑城有半个世纪，但就此分析筑城之利并无不妥。黄榦称瓜洲有城使得“师之出入皆有所恃”，又言“武昌之师自汉阳而济”，按武昌在汉江南，武昌军队济汉水入汉阳，是往北渡江以守御，亦可看作是渡江以图军事进攻。以瓜洲之于京口同汉阳之于武昌类比，则可见黄榦眼中，其一，瓜洲城对南岸京口起到了很好的保护作用；其二，南岸镇江之军北渡，瓜洲可以很好的作为一个北进的桥头堡，使来往军队有所凭依。可见，黄榦就不只将城视作单纯的防御设备，而是看到了它在整个军事作战之中的作用。

此外，就地理位置而言，瓜洲是长江南北之重要渡口，处扬州、镇江之间，是两浙同两淮之交通枢纽。高宗时，陈造就见“战船自瓜洲至淮，首尾相接四五百里”^②，其交通要紧可知。又绍兴末隆兴初，洪适曾总领淮东军马，“符离用兵，馈饷繁夥，适究心调度，供亿无阙”^③。洪曾上札指出瓜洲一地于纲粮运输之重要，如其《过江催发米纲札子》：“臣遂于次日躬亲过江，至瓜洲，方见齐侏、武琪纲相继入闸。”^④又《会计军储札子》：“所有来年军用，如遇闭闸，则依去年例，候江东纲到，就拨往瓜洲，卸入新仓，令淮南漕臣宋晓措置建运。或纲运不到，则令陈汉用浙西舟船将镇江钱米运在瓜洲津发，所有漕运必不致有误军期。”^⑤又据《宋会要辑稿》食货40之42载：

（乾道元年）二月十三日，淮南转运判官韩元龙奏：“淮东路逐年收买镇江诸军一半本色马草二十五万束，赴镇江府北草场交纳，所用本钱，每束一百文省，计钱二万五千贯文，系两浙转运司分下两浙州军支拨应副。本司照应，本路所买马草，系是茭草，八、九月内收刈，十月始干。装发之间，潮水不应，隔江阻闸，艰于津发。若不别行措置，窃虑迟滞，有误支遣。欲于瓜洲镇置场交受，令镇江府诸军用船过江前来就支，止是一水，委是快便。其监官令瓜洲监镇或监闸、巡检兼管，及本司依先降指挥别差官一员同共收纳，就用镇江府北草场合千人兼行管干，更不别置官吏。”从之。^⑥

① 黄榦：《勉斋集》卷28《汉阳申朝省筑城事》，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，第1168册，第300页。

② 陈造：《江湖长翁集》卷27《周枢密札子（前缺）》，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，第1166册，第350页。

③ 《宋史》卷373《洪适传》，第11563页。

④ 洪适：《盘洲文集》卷41《过江催发米纲札子》，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，第1158册，第521页。

⑤ 洪适：《盘洲文集》卷42《会计军储札子》，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，第1158册，第526页。

⑥ 徐松辑，刘琳、刁忠民、舒大刚等校点：《宋会要辑稿》食货40之42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4年标点本，第6899—6900页。

淮东路的粮草由长江南岸镇江府北草场提供。此前需要由江北差人前往镇江差买，再过江返回江北，考虑到行程不便，乾道时在瓜洲镇置场，由镇江府将粮草运至瓜洲，淮东路直接前往瓜洲接收钱粮。虽然粮草经历一次过江过程，但却减少淮东路方面收买粮草的压力。既有此举，则瓜洲一地就成为南北军粮转运要地，屯聚了大量的粮草。按洪适在隆兴二年（1164）被调回朝廷，召贰太常兼权直学士院^①，则《会计军储札子》当上于此，可见隆兴时江东纲粮在特定时期已需转运至瓜洲，而至乾道时此则成为定例。

战争时期，军粮转运尤为重要。正因瓜洲重要的战略地位，在此筑城就可达到保障粮运安全的目的，可以使来往运转之粮草有城内可屯聚之地。宋末，元兵曾攻占瓜洲，阿术立木栅于扬子桥，以“断淮东粮道，且为瓜洲藩蔽”^②。这正是瓜洲于南宋在粮草转运方面重要之体现。即便到了元朝，瓜洲城依旧是粮食屯聚转运的要地，“此城屯聚有谷稻甚多，预备运往汗八里城以作大汗朝廷之用……由是满载之大船，可从此瓜洲城航行至于汗八里大城”^③。

瓜洲城得以筑城，到底是出于军事原因。袁说友曾过瓜洲之皂角林并留下诗歌：“南北城高俯堑深，过帆猝猝倦登临。两山未远瓜洲渡，十里俄惊皂角林。坐想英灵犹炯炯，眼看祠庙独阴阴。塘村共说兴亡处，笑指东河血未沉。”^④皂角林、瓜洲渡之战事即绍兴末完颜亮南侵事^⑤，显然瓜洲与其南北城已经为典型的战争意向。

结 语

瓜洲城的修筑，主要受南北关系及自然环境的双重影响。宋代瓜洲初未有城，南北宋之交，始有人建议筑城，但未落实。至绍兴末年完颜亮南侵，宋金在此对峙，宋人凭借“短垣”和树木进行防御，金人攻占瓜洲后，有筑城之举。至宋孝宗时，随着隆兴北伐失败，不久后曾经反对筑城的张浚亦被罢免，孝宗对金军事方针有一定转变，更重视军备建设，在淮西地区就表现为大范围筑城之举。孝宗时瓜洲有3次筑城，隆兴时以绍兴末南北小垒为基础修城；乾道四年修城规模较大，而南城尤特，因其修成弧状，形似簸箕，时人称其“簸箕城”，然旋未久，南城便因风涛废毁；淳熙年间，瓜洲城（北城）再遭修筑。修筑后的瓜洲城，主要发挥了其驻扎军队，转运囤积粮草的战略作用。此后，直至宝祐四年，由于对蒙古战争的军事需要，瓜洲城复修筑，此次除修补之外，又新筑南侧边江的女须护城、排柴木、蛤蚧坝等设施。之后蒙古攻宋，守军焚瓜洲城内庐舍，送城于敌手，而南宋史下之瓜洲城遂宣告结束。

（作者单位：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）

本文责编：程方勇

① 参见《宋史》卷373《洪适传》，第11563页。

② 《元史》卷8《世祖五》，第166页。

③ [法]沙海昂注，冯承钧译：《马可·波罗行纪》第147章《瓜州城》，中华书局，2004年标点本，第558页。

④ 袁说友：《过皂角林》，《全宋诗》卷2577《袁说友四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，1990年标点本，第48册，第29944页。

⑤ 参见李心传撰，胡坤点校：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》卷193“绍兴三十一年十月乙丑”条载：“乙丑，镇江府左军统领员琦及金人战于扬州皂角林，败之。”（第8册，第3771页）乾道二年（1166），蒋子礼列皂角林为十二处战功之一。（李心传撰，徐规点校：《建炎以来朝野杂记》甲集卷19“十三处战功”条，中华书局，2000年标点本，第449页）